

赋税 “于礼”，“使民也义”

——《论语》中关于孔子的财政观

在《论语》中，关于孔子国家财政的思想，也有较多记载。首先是薄敛轻税。

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税收，主要是对国家颁赐的井田征税。称作“籍”；税率是十取其一，称为“彻”。春秋时代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税赋进行改革，一方面是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，另一方面是提高税率，即突破十取其一。孔子极力反对这种改革，认为它破了“籍”、“彻”，坏了周礼，属于“聚敛”。他主张税赋“于礼”，敛从其“薄”。《论语·先进》中说：“鲁人为长府，闵子骞曰：‘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改作！’”。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鲁国大臣要扩建国库，闵子骞提出了反对意见，孔子听了十分欣赏。说这小子不轻易开口，一开口就很中肯。《先进》中又说：“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‘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叫也！’”季孙氏比周公还富有，而冉求还替他四处搜刮人民，孔子气极，不承认他是自己的门徒，号召门人群起而攻之。

其次是重视税源。据《论语·颜渊》记载，鲁哀公因财以收入不够用，问计于有若。有若建议他恢复“彻”法。哀公说：“十分抽二我都不够用，你怎么还让我恢复十分抽一呢？”有若正经回答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意思是说：“如果百姓富足丁，那您怎么会不富足呢？如果百姓不富足，那您又怎么会富足？”有若的话充分反映了孔子的思想。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的。赋税轻，百姓的经济状况就好，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有了可靠的来源。赋税重，甚至竭泽而渔，百姓生计断了，国家的税源也就断了。这个论点指出了国家财政对国民经济的依赖关系，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对这种关系的最早表述。孔子能正确地认识培养税源的重要意义，能从生产的观点去理解租税问题，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。

再次是限制徭役。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，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，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以两种方式取得：赋税和徭役。赋税以实物形式从被统治者那里征收劳动产品，徭役则是直接强制百姓提供无偿劳动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记载，孔子评论子产时说，子产有四种君子的道德，其中之一就是“使

民也义”。即役使民众要符合道义，就是在征调民夫为国家服徭役时，要遵守义的原则和礼的规定，不可强拉硬派，不可师出无名，使百姓的徭役负担过重。早在孔子以前，反对过重徭役的思想已经有人提出，《诗经》中就有不少谴责、抗议苛重徭役的诗篇，管仲已把“无夺民时”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思想提了出来。孔子的贡献就在于他把限制徭役和礼义联系起来。孔子在限制徭役方面还提出了“使民以时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的观点，即役使民夫的时机要恰当，要尽量选择农闲时间，不要违背农时。这和管仲的“无夺民时”的意思大体接近。在农忙时役使民夫，必然会影响农业生产，这不仅给农民生活带来困难和损害，也会破坏国家的财政基础。民时就是农时，农时就是天时，违背不得，马虎不得，轻蔑不得。

最后是提倡节用。《〈论语·学们〉中记载，孔子说治国之道要“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。就是要敬重政事，讲求信用，节约费用，爱护人民。从国家角度讲节约费用，就是节约财政开支。这和薄敛轻税是一致的。薄敛轻税，财政收入就有限而财政收人有限，财政支出就要打紧。不敢大兴土木，花天酒地，声色犬马。

有点钱粮要花到正路上，除了正常的政府开支以外，还要挤出一点搞点农田水利，赈济救灾，文化活动什么的，以示爱民。若不量入为出，甚至寅吃卯粮，就必然要加重税收，搜刮百姓。其结果是百姓不足，君亦不足，导致恶性循环，直至政权颠覆。所以，节用的观点，实在是孔子财政思想的重要组成。